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英〕马凌诺斯基 著

梁永佳 李绍明 译
高丙中 校

THE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华夏出版社

K891
ZM138L ✓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英] 马凌诺斯基 著
梁永佳 李绍明 译
高丙中 校



A0917093

1985/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英)马凌诺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2

(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

ISBN 7-5080-2561-X

I. 西… II. ①马…②梁…③李… III. 西太平洋-太平洋岛屿-
风俗习惯 IV. K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754 号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英] 马凌诺斯基 著

梁永佳 李绍明 译 高丙中 校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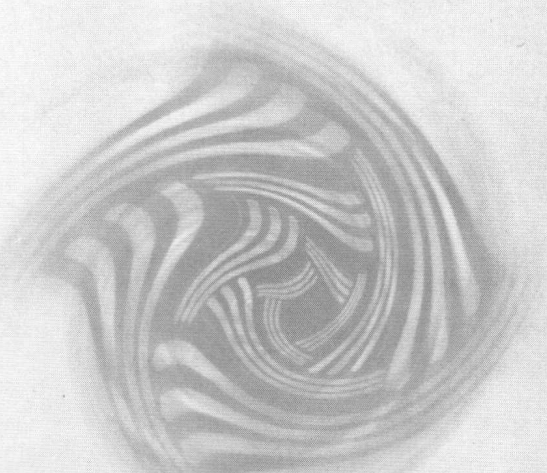
开 本: 670×970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450千字

定 价: 4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顾问委员会

- 费孝通(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杰出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
李亦园(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
巴尔金(David Parkin, 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所教授、所长)
宋蜀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民族学会会长)
潘乃谷(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乔健(台湾东华大学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教授)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尹绍亭(云南大学人类学教授) | 周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人类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 刘力(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和少英(云南民族学研究所教授) |
| 刘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 | 罗红光★(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文化人类学中心主任) |
| 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教授) |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系教授、
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 徐新建(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 杨贵凤(华夏出版社社会科学事业部编辑) |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 纳日碧力戈★(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室主任) |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 陈小兰(华夏出版社社会科学事业部主任) | 阎云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 |
| 陈志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 麻国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
| |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 | 蔡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注：带“★”号者为常务委员

总 序

去年,“人类学书系”编委会约我在“书系”顾问委员会参加工作,今年年初还跟我说,丛书经过初步的讨论,已经有了一点眉目。在编委会和华夏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书系”现在开始与读者见面,列入了我在半个世纪以前翻译的两部著作《文化论》、《人文类型》及其他几部由年轻学者新译的同类作品,首先以“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为专辑总题出版。在时代变迁如此迅速的今天,“书系”能先以基础作品为重,着力学科建设的基本功,这对于新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从 1979 年以来,中国人类学开始得到恢复和重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这门学科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各学科中,也开始产生一定影响。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综合院校,相继设立人类学研究中心、系、专业、研究所,而中央民族大学等大批民族院校也在原有的民族研究单位内部发展人类学专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民族、社会学研究所,人类学的研究机构也得以创办。这些新的发展,预示着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意味着人类学书籍的阅

读群体,将有扩大之势。

人类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应合着人类发展的新形势。21世纪刚刚开始,人类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信息社会的发展、新经济的产生、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的初步出现、文化—宗教传统之间对话的新需要,等等,即将给人文世界的面貌带来许多值得关注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经过20世纪的“三级两跳”,进入了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国内,改革和“西部开发”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城乡关系。在整个国家向世界开放的今天,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会增添不少的新内容。与国内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同时,我们在世界格局当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学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要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和发展解答一些难度空前的问题,为这个世界的“和而不同”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人类学工作者如何才能不负众望,通过扎实的研究,“从实求知”,对现实提出真问题并给予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的解释?这必然是中国人类学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时间算起,中国人类学已经存在一个世纪了。但是,在这一百年中,这门学科的发展有三十年是停顿的。有时,历史的记忆可以挥之即去,但历史留下的影响却不会瞬间即逝。几年前,我曾对自己和恢复发展中的社会学学科提出“补课”的建议。现在看来,这项建议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或许也值得参考。在学科的重新恢复以来,我们重新面对学科底子薄弱的问题,经历了三十年停顿,我们的学科失去了原来应有的连贯性和知识积累,

对于外界发展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对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也缺乏继承和梳理。

我曾用“文化自觉”来形容中国文化在新的世纪中所要承担的使命,“文化自觉”就是要求我们要在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展望世界,对于自身在世界之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在 21 世纪,中国人类学要得到发展,不仅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对话中解释“文化自觉”的问题,而且还要以学科的“文化自觉”为己任,对中外不同知识传统展开“补课”和学习。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学科基础的重建是首要的;而若要进行学科基础的重建,学者自我的知识更新、高级人才的培养等等,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落实学科基础的重建工作,为了“开风气、育人才”,系统的出版工作相当紧迫,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人类学家做了很多值得肯定的基础建设工作,但是,很多人类学译作和论著被分列于不同的丛书和杂志出版,失去了它们本应起到的总体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类学工作者的研究及人才的培养,面临着很多问题。目前,人类学的科研教学机构得到大量增加、学生的数量也随之增多。由于我们对学科的历史面貌、现状和未来走向缺乏系统的表述,因而出现了学科知识“供不应求”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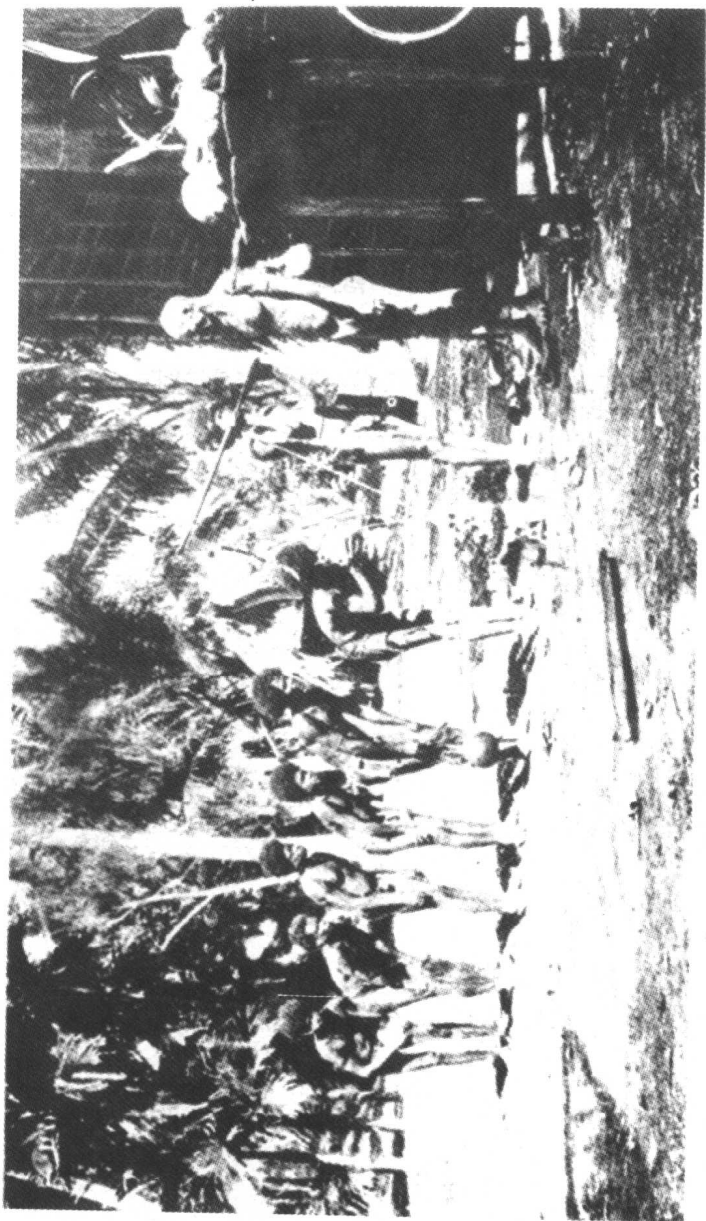
与社会科学其他门类一样,人类学恢复有 20 年了,我们的学科需要积累和发展。像这样的学科建设系统工程,需要大家来共同推动和维护。“人类学书系”的出版工作从基础入手,重刊和新译对创建现代人类学有杰出贡献的主要作品,并以此为基础,发表新近的人类学教材、译作和论著。对此,华夏出版社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中国人类学的“开风气、育人才”给予有

力的值得称道的支持。学科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延续性。我希望这项学科建设的工程，能在学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合作下，得到长期的发展，希望我国学者能在放眼世界的同时，立足本土，在将来编写出结合中国国情的教材，发表具有独创意义的论著，以学科建设的共同事业为共同目标，对中国人类学的“文化自觉”做出新的贡献。

费孝通

献 给

我的朋友兼师长 C. G. 塞里格曼教授



一个库拉仪式

序

我尊敬的朋友 B. 马凌诺斯基博士要我为他的书作序，虽然我的言辞未必能给这部卓越的人类学著作增色，但是我还是欣然遵命了。我的评述——如果算得上评述的话——打算围绕作者的方法和本书的课题两个方面展开。

关于方法，就我所见，马凌诺斯基博士的工作是在最佳情形下，并且是以预计最有保证得到最好的结果的方式进行的。他在理论训练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都很出色。就理论训练而言，他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家庭那些博学而睿智的论著可资证明；¹ 在实践经验上，他的有关新几内亚迈卢 (Mailu) 土著的描述无与伦比，² 这些描述是他在土著人中逗留六个月的产物。现在，马凌诺斯基博士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几内亚东面的特罗布里恩德 (Trobriand) 群岛。他成年累月地呆在土著人中间，像土著人一样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用他们的语言交谈，并且从最稳妥的渠道搜集资料——亲自观察并且在没有翻译介入的情况下由土著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对他讲述。就这样，他积累了大量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材料，内容包括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社会、宗教及经济或产业生活。他有意在以后全面发表这些材料，在本书中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对特罗布里恩德社会一个有趣而独特的方面的初步研究。那是一种非凡的交换制度，它仅仅部分地属于经济或商业领域，它运行于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以及相邻岛屿的居民之中。

我们无须多加思索即可相信，在人类从最简陋到最高级的所有阶段中，

1.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13.

2. "The Natives of Mailu: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Robert Mond Research Work in British New Guinea."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ustralia*, vol. xxxix. 1915.

经济力量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类毕竟是动物界的一部分,也要像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知识、道德、社会等较高级的生活形式;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这些物质基础包括一定程度的温饱和栖身之所,它们构成了经济或产业基础与人类生活的初始条件。如果说人类学者至今对这一基础仍然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宁愿假定那是因为他们被人类特性的较高层面所吸引,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忽略和低估那些较低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了体谅他们的这一疏忽,我们也要记住:人类学还很年轻,学者们面临的众多课题不可能立即被全部突破,只能逐一攻克。也许正是如此,马凌诺斯基博士才挑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居民那独特的交换制度,强调了原始经济活动的巨大意义。

他没有满足于对交换过程的描述,而是力图去透视隐藏在其后的动机及其在土著人心底激起的情感。或许有人认为:纯粹的社会学应当限定在行为描述内,而把动机与情感问题交给心理学。的确,动机与情感分析在逻辑上有别于行为描述,严格地说,它的确属于心理学领域。但实际上,一个观察者如果不了解或不推测行为人的思想与感情,那行为对他也就毫无意义。因此,描述一系列行为而毫不涉及行为人的意识状态,就达不到社会学的宗旨,因为社会学的目标并非只是记录而是要搞清楚社会中人的行为。这就是说,如果不在每一环节引入心理学,社会学就不能完成它的任务。

马凌诺斯基博士在方法上的特色,在于对人的本质的复杂性予以全面的考虑。也就是说,他完整地而不是平面地看待人。他牢记着,人作为情感动物的一面不亚于人作为理性动物的一面,他坚持不懈地探寻人类行为的情感基础和理性基础。科学家同文学家相仿,太容易抽象地看待人,只在我们这种复杂而多面的生命中选择一个单一侧面予以思考。大作家中,莫里哀是作这种单面处理的显著例子。他的人物都是扁平的:要么是吝啬鬼,要么是伪君子,要么是浪荡哥儿,就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人。他们全都是穿戴起来的木偶,看起来像人,实际上只是表面像,里面却是虚浮和空洞的,因为本质的真实被葬送给了文学效果。更伟大的作家们对于人性的表现则大不一样,例如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的人物都是坚实的,不是从一个而是从多个侧面描绘出来的。毫无疑问,科学中一定的抽象处理不仅合法而且必要,因为科学无外乎是升华到最高权力的知识,而所有知识都隐含着

一个抽象概括的过程。即使是辨认一个我们天天都看得见的人，也只能依靠对他过去外貌的提炼而得到的抽象。因此，研究人的科学不得不抽象出人性的某些方面并脱离具体事实来思考；或者把人的科学分解成若干学科，每门学科只探讨人的复杂机制的一个单一部分，这些部分可以是人类的生理、智力、道德、社会的某一侧面。它所得出的结论只能多少提供人作为整体的不太完整的图像，因为组成这图像的线条只不过是多方面中择取的必要却又微小的一部分。

在这部专著中，马凌诺斯基博士主要关注的，是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一种初看起来似乎是纯经济性的活动。但是，凭着素有的宽广视野和精敏理解力，他审慎地指出，发生在特罗布里恩德及其他岛屿居民之间的贵重物品的奇异周转，虽与普通的贸易相伴随，但其本身却决非纯粹的商业性交易。他揭示出，这种周转不是建立在对实际效用和利润得失的简单计算上，而是因为它满足了比动物性满足层次更高的情感与审美的需要。马凌诺斯基博士由此对所谓“原始经济人”的概念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这一概念像是一个妖魔，仍然游荡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并将其恶劣影响延伸到了某些人类学家的头脑中。这个可怕的妖魔，披着边沁(Jeremy Bentham)和格拉格兰德(Gradgrind)的破烂外衣，按照斯宾塞原则(Spencerian principles)，在抵抗最弱的路线上，听命于无情追逐不义之财的动机。如果严肃的探索者们真的接受了这种凄凉的虚构，以为它在未开化社会中确有蓝本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用的抽象，那么，马凌诺斯基博士在本书中关于库拉(kula)的描述，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搬倒这个妖魔。因为他证明了，在库拉体制中，有用物品的交易在土著人观念中完全低于其他物品交换的重要性，而那些物品绝无实用目的。且不说这种独特制度施行的地理范围之广，仅就其对商业事务、社会组织、神话背景、巫术仪式的综合而言，似乎在现存人类学记录中是史无前例的。但其发现者马凌诺斯基博士则非常正确地推测出，它可能是一种制度类型，即使不会精确地类同，类似的例证此后也必将通过对蒙昧和野蛮民族的进一步研究中揭示出来。

巫术在制度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根据马凌诺斯基博士的描述，这是库拉的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特色。他的描述告诉我们，在土著人的观念中，巫术仪式的举行与符咒的念诵，对库拉交易的事业在其所有阶段上

的成功都是不可或缺的：从伐木造舟，到远航队大功告成，带着贵重货物准备踏上归程。此外我们也偶然了解到，对于园圃(garden)的耕种和成功的捕鱼这两种提供给岛民主要生计方式的劳作形式来说，巫术仪式与咒语也同样必要。正因如此，那些通过喃喃念诵以促进园圃增产的园圃巫师，就成了村落中最重要的的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酋长和大巫师。总之，人们相信巫术是所有劳作中绝对核心的要素，与机械性操作——例如，独木舟的堵缝、髹漆和下水、园圃的栽种、捕鱼装置的设置——同样必要。马凌诺斯基博士说道：“对于巫术的信仰是一种导致特罗布里恩德岛经济活动组织化和系统化的主要心理力量。”

巫术不仅对于社区的福祉甚至对其根本生存而言，都是一种基本的经济性因素。这一极有价值的阐述，应足以驱除关于巫术的一种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完全无视巫术对公共福利的影响，认为它与宗教相反，总是被个人用来满足私欲，伤害私敌，就其本性而言，它是邪恶的、反社会的。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巫术可以而且实际上大约也曾经被如此应用；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我们相信巫师们也同样为了某种险恶的目的，曾用它来激起土著人深重的恐慌和持久的焦虑。但巫术自身本无所谓善恶，它仅仅只是一种操纵自然力的想像力，这种操纵可以被巫师用来为善或者为恶，用来造福于或者伤害个人与社区。在这方面，巫术恰与科学站在同样的立足点上，如同它的庶出姐妹。它们本身都无所谓善恶，尽管依使用的不同，它们会变成善或恶之源。例如，用于治病救人的药物知识也常被用来毁灭人，因此而污蔑制药是反社会的岂不荒谬？漠视巫术善的用途，单挑恶的用途作为其特性来定义它，也是同样荒谬的。科学以现实的方式而巫术以想像的方式来操纵自然过程，这些过程并不因那些以他的知识来促其运动的个人的道德倾向、好的或坏的意图而受影响。药物对人体的作用也同样如此，无论施药者是医生还是毒犯。大自然与她的女仆对道德非敌非友，她们漠然处之，同等地准备去接受圣徒和罪犯的命令，只要他给她们合适的指令。如果弹药上好了膛，火炮也已瞄准目标，那么炮兵的开火将具有同样的破坏性，不管那些炮兵是为保卫祖国而战的爱国者还是从事不义之战的侵略者。按当事人的使用方式和道德倾向去分辨一门科学和技艺，其荒谬性明显足以与制药和火炮之例相比。尽管对许多人而言表面看来不是那么明显，但却同

样真实的是,对于巫术看法的荒谬性也是如此。

马凌诺斯基博士的这本书在读者意识中造成极为坚实的印象,而巫术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整个生活和思想施加的巨大影响,大概正是其特色。他告诉我们,“巫术,这种直接以一种特殊知识支配自然力的企图,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是无所不在而且是绝对重要的”;它“渗入到所有的工业和集体活动中”;“迄今收集到的所有资料都显示了巫术在库拉中的极端重要性。但如果我们观察土著人部落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发觉每当遇到至关紧要的事情,他们都会寻求巫术的协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土著人认为巫术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提供主宰自然的力量,它是人类抵御各种危险的武器和盔甲”。

因此,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看法里,无论为善还是为恶,巫术都是具有超级重要性的力量。它可以创造或破坏人的生活,可以支撑和保护个人与社区,或者伤害与毁灭他们。较之这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对死后精神存在的信仰就显得看似通行但却对这些人的生活少有影响。与原始人对离世者灵魂的一般态度相反,据说他们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对鬼魂的恐惧。他们确实相信,鬼魂们每年回村庄一次,参与一年一度的盛大宴会,但“一般来说,鬼魂对人们的祸福也没有什么影响”;“人鬼之间不存在什么构成宗教崇拜核心的相互影响与亲密合作”。这使得巫术明显比宗教重要,至少比死亡崇拜重要,在像特罗布里恩德岛民这样野蛮程度相当高的民族的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由此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证据,表明这种世界性范围的欺骗,在人类意识上曾经具有并且仍然具有的支撑是非常强大和顽固的。

毫无疑问,从马凌诺斯基博士研究的报告中,我们将增长许多诸如在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中巫术与宗教的关系之类的学问。从他曾经对一个独特制度的耐心观察中,从他对这一制度的细致阐述中,我们可以推知他正在准备中的著作的规模和价值,那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关于一个野蛮民族的最完整、最科学的描述。

詹姆斯·G. 弗雷泽

伦敦大教堂

1922年3月7日

前 言

民族学正处在一个即使不是悲剧性的也是十分尴尬的境地。正当它整理好作坊,打造好工具,准备不日开工时,它要研究的材料却无可挽回地急剧消散了。当科学的田野民族学方法和目标初具规模,当训练有素的人们踏上征程,去研究未开化区域的居民时,他们却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了。

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员对土著民族所作的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科学化、条理化的调查可以带来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这一点即使最佳的业余工作也无法比及。绝大多数的现代科学描述都为我们展示了部落生活的新奇面貌。这些描述清楚地展示了一幅幅社会制度的图画,其宽广和繁复程度往往出人意料;这些描述把生活在宗教和巫术的信仰和实践中的土著人形象带到了我们眼前;这些描述史无前例地让我们洞察到土著人的精神世界。从这些科学性的新材料中,比较民族学(comparative ethnology)学者们已经得出了某些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些结论涉及人类风俗信仰和制度的起源,涉及文化的历史、传播和接触,涉及人类社会行为与人类精神的法则。

然而,正当我们希望科学专家通过劳动获得原始人类新形象的时候,它却在瞬间化为泡影。因为,尽管目前尚有一大批土著社区可供科学研究,但在一两代人之内,他们或他们的文化实际上就要消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急需大量的精力投入。然而直到现在,公众对这些研究仍未产生足够的兴趣。工作人员数量不足,他们所得到的鼓励少之又少。因此,对于一份专业田野民族志者的民族学作品,它的价值不言自明。

在本书中,我只是通过描述部落往来的一种形式——新几内亚土著人的贸易关系,展示了原始生活的一个层面。这一阐述作为一个初步的个案报告,是从覆盖了一个地区部落文化全部领域的民族志材料中遴选出来

的。当然,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些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尽管本书的主题是经济(因为它说的是商务事业、交换与贸易),但却不得不经常涉及到社会机制、巫术力量,涉及到神话与传说。实际上,如同涉及主要方面一样,它将涉及到所有其他方面。

本书涉及的地理区域限于处在新几内亚东端的“群岛区”(The Archipelagoes)。即使在这么小的区域,主要研究范围也只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一地。不过,这一地区被考察得十分细致。在三次去新几内亚考察的过程中,我在那个群岛上生活了大约两年,其间很自然地获得了对当地语言的透彻了解。我完全一个人工作,大部分时间直接生活在村落中。因此,土著人的日常生活经常呈现在眼前,而偶发的、戏剧性事件,如死亡、吵架、村落纷争、公共的和庆典性事件等,也未逃过我的注意。

民族志的现状要求进一步拓展研究路径,调整其研究领域,所以,它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因此,每篇新作都应该在几个方面证明自身的价值:它应显示方法上的某些改进;它应在深度、广度或这两方面超过以往;最后,它还应努力以一种精确但并不枯燥的方式表达其研究结果。关注方法的专家可以在本书的导论(二)至(九)节和正文第十八章中找到我在这方面的观点;关心材料甚于关心材料获得方式的读者,将会在第四至第二十一章中发现有关库拉远航以及各种各样相关风俗和信仰的连贯故事。不仅关注故事而且关注民族志背景和库拉制度定义的学者,将在第一和第二章中发现前者,在第三章中发现后者。

我要对罗伯特·蒙德(Robert Mond)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由于他的慷慨资助我才有可能进行数年的研究,本书正是这一研究的部分成果。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联邦内政和国土部大臣阿特利·亨特(Atlee Hunt, C. M. G.)先生,是他的部门给予了我财政支援和大量的实地协助。在特罗布里恩德,珍珠商人汉科克(B. Hancock)先生给我的工作以巨大的帮助,我不仅要感谢他的协助和服务,更要感谢他以大量行动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承蒙我在维也纳的朋友保罗·昆那(Paul Khuner, 一位现代工业事务专家兼卓越的经济思想家)的批评,本书的许多论点得到了大大的改进。承